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公开 _____
编号 10741 _____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与
治理路径研究

研究生姓名：李海波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李兴平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研究

提交日期：2023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海波 签字日期： 2023.5.31

导师签名： 李兴平 签字日期： 2023.5.3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海波 签字日期： 2023.5.31

导师签名： 李兴平 签字日期： 2023.5.31

Research o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governance path of China's network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Candidate : Li Haibo

Supervisor: Li Xingping

摘要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在规定，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国家安全能否得以维系的最大变量，亦是衡量国家安全的刻度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一旦遭到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网络领导力也将难以维系，国家安全更无从谈起。因此，新时代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不仅不容许别国破坏，更需要向全世界传播，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强保障和内生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我国不断进行建设网络强国的部署，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纷繁复杂，斗争复杂多样。对外，西方国家不断加强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和技术封锁；对内，完善的网络法制体系有待健全，公民的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尚未形成。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层出不穷的理论难题、现实困境、外部挑战、内在风险等都亟待研究解决。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和领导力；必须建立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加快网络立法，使网络空间的各类不良现象有法可依；必须深化网络技术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队伍支撑；必须培育公民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使我国公民有序、有度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推动网上网下齐抓共管，形成治理合力。综上所述，必须以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进之力加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凝聚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力量，形成抵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屏障。

关键词：新时代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风险防控 治理路径

^①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Abstract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the internal regul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 the top priority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network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variable of whether national security can be maintained, but also the scale to measure national security. Once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ideology is destroyed, the network discourse power and network leadership of mainstream ideology will also be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ll not be mentioned. Therefore, China's network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not allowed to be destroyed by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needs to be spread to the world and widely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the world for a hundred years. We must unswervingly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ke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ideology a strong guarantee and internal impetus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China has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the deployment of building a network power,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twork ideology. Externally, western countries have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infiltration of network ideology and technical blockade against China; Internally, the perfect network legal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citizens' awareness of network ideology community has not yet formed. There are endless theoretical problems, practical dilemmas,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internal risks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ideology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and solved.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ideology,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and enhance the attraction, persuasion, appeal and leadership of mainstream ideology; We mus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network legal system, speed up the network legislation, and make all kinds of undesirable phenomena in cyberspace have laws to follow; We must deepe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vigorously cultivate compound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the talent team for modernization; We must cultivate citizens'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network ideology, enable ou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ance of network ideology in an orderly and orderly manner, and promote the joint efforts of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o form a joint governance force. To sum up,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twork ideology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whole party,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gather the strength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China's network ideology, and form a barrier to resis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ideology.

Key words:New era; Network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 prevention, control ; Governance path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3
1.2.1 国外研究现状	3
1.2.2 国内研究现状	7
1.2.3 研究述评	9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0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10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10
1.4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11
1.4.1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11
1.4.2 研究的创新点	11
2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相关理论阐述	12
2.1 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	12
2.1.1 意识形态	12
2.1.2 网络意识形态	13
2.1.3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13
2.2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理论基础	14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	14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16
2.3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22
2.3.1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22
2.3.2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社会稳定	22
2.3.3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人民幸福	23

3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	24
3.1 网络技术的依附风险	24
3.1.1 西方国家实施网络技术封锁	24
3.1.2 我国网络技术自主创新不足	25
3.1.3 我国网络技术人才数量短缺	26
3.2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风险	27
3.2.1 利用先进技术谋求网络话语霸权	27
3.2.2 通过境外组织培养网络代理人	28
3.2.3 输出西方文化进行信息殖民	29
3.3 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语风险	30
3.3.1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正面形象受到攻击	30
3.3.2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领导力遭到争夺	31
3.3.3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体系创新不足	32
3.4 网络意识形态微舆情失控风险	33
3.4.1 舆情监控与反馈机制不完备	33
3.4.2 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34
3.4.3 网络行为主体的失范言行频发	34
4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与治理路径	36
4.1 守好网络安全技术命门	36
4.1.1 发挥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36
4.1.2 推进网络技术自主创新	37
4.1.3 培育综合素质强的网络工作队伍	38
4.2 应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39
4.2.1 揭露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目的	39
4.2.2 培育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网络代理人	40
4.2.3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2
4.3 铸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43
4.3.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43
4.3.2 创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	44

4.3.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引导效能	46
4.4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及应急机制	47
4.4.1 预测“爆点事件”进行舆情引导	47
4.4.2 深入推进网络法制化进程	48
4.4.3 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综合素养	49
5 结语	51
参考文献	52
致谢	57

1 绪论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国内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信息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与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当代国家总体安全观中阐述的非传统安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必须立足当下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深入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前，网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和主阵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我国公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获取和传播信息、游戏娱乐、医疗办公等功能使互联网聚集了大量的用户，构成了人数仅次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②我国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之时，西方国家的暗棋在我国网络空间中趁势而入，各种“非马”“反马”思潮也纷至沓来，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推进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需要，我国不断进行建设网络强国的部署，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奠定了基础。当前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纷繁复杂，斗争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难题、现实困境、外部挑战、内在风险都亟待研究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③因此结合当今互联网全球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 北京：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32（02）：39.

^②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4.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9.

化的现状，对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及其治理路径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1.1.2 研究意义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催动了国内众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同时也使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波谲云诡。对内，公民尚未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健全的网络法制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对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对我国实行网络封锁，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也已昭然若揭。不日新者必日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认清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和挑战，不断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的研究。该研究事关国家利益、社会稳定、人民幸福，这不仅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更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在要求，对于新时代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共识、积蓄力量、团结人心，具有纲举目张的理论意义和夯基筑台的实践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加深对网络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研究。厘清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是进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的第一步，概念模棱两可那么研究出的治理路径就没有针对性，缺乏说服力，丧失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战略后，网络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开始活跃在学术界。但相关的学术论文中，最初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或者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延伸，这种定义显然是不妥的。而党的十九大之后，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定义虽然有了不同的见解，但大多仅仅是就网络意识形态的某个特点对其进行定义，这种定义显然不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网络意识形态。因此，为客观、全面地对网络意识形态做出定义就成为必要。本论文将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探讨，并结合现有的学术界成果，进一步加深其理论的认识。

第二，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网络时代中，虽然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相较于传统意识形态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科学理论的地位没有变，其仍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的地位也没有改变。

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1.2.2 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治理方略。网络视域下，意识形态工作更加变幻莫测，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容、对象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新问题。本论文基于唯物辩证法以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学界前辈们的经验，在“变”与“不变”中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治理路径进行探究，既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地位“不变”，又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寻求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治理方式之“变”。

第二，有利于增强我国公民的网络共同体意识。随着网络技术、信息传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公民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由的舆论环境、快捷的传播方式恣意抒发着自己的观点，殊不知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四通八达的信息获取渠道也变成了束缚公民视野的“信息茧房”，人们基于大数据算法获取的被推送给自己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自己所发出声音的回音与回应。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公民尚缺乏网络共同体意识，认为自己是需要被保护的一员，而不是参与网络治理的主体。通过对公民进行必要的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知识普及，牢牢把握人民群众这个主体，有助于将公民这个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最大变量”变为“最大增量”，增强其共管共治的网络共同体意识。

第三，有助于推动我国网络技术发展并建立健全我国网络法制体系。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技术受制于人，陷入了被人“卡脖子”的窘境。网络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如果核心技术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发展得再快也有可能被抄底的风险。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有关部门提供法律武器，否则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就会成为一柄没有剑鞘的利剑，伤人也伤己。因此，本论文通过分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和治理策略，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网络法制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1.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各国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比如美国先前鼓吹的“网络自由”以及当下推行的“清洁网络”等。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西方学者就已经掀起了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浪潮，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2.1.1 早期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一词是由希腊语中的“理念”（eidos）和“逻各斯”（logis）构成的新词，可以定义为“观念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由启蒙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首次提出，他认为科学必须建立在通过感觉获得观念发生的原因的精确知识的基础上，因此意识形态就是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第一科学”。^①随后，拿破仑便对德斯杜特·特拉西的观点进行抨击，拿破仑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形而上学”^②，这种“空谈误国”的学问最终会导致“一种激进、危险的政治情绪”^③。葛兰西则并未个意识形态赋予政治意味，他提出意识形态是人类个体或在群体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价值判断，并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当中。^④

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从理论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念的形成，特拉西的“观念学”和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则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恩格斯从三方面对意识形态做出了定义，其一，在认识论意义上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是对现实事物的颠倒认识，必须将这一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并将其贯穿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批判，这将是获得“历史真实性”认识的途径。^⑤其二，在价值论意义上它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⑥其三，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是“社会意识形式”，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映经济基础的。^⑦尽管马克思恩格

①[法]Destutt de Tracy.《Éléments d'idéologie》[M].France,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2012:28.

②[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8.

③[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4.

④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Wishart,1971:328.

⑤何丽琼.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1.

⑥梅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D].河南大学,2012.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斯在对多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其实质是与国家意志、思想统治和阶级意识同一序列的概念，^①而由于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上存在重大差异，因而现代意识形态又必然具有其独特方面。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各种演绎和争论也是从这里发端的。

1.2.1.2 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展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思想家大体上继承了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可大致分为下述几个发展类型：

其一，列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做了创造性的演绎。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就必须要以意识形态来对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阶级意识，总是借以表达某个阶级的利益、情感和认识的方式。^②

其二，在卡尔·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意识形态根据过去理解现在并掩盖现在，乌托邦则超越现在与取向未来。^③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前者“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地伪装”，后者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④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指出在社会之中、为集体所共有的思想或观念体系。

其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被看作是科学、文化、技术层面上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针对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人阶级觉悟一直没有在西方成为现实这一现象，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是总根源。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入手，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该学派的哲学家使用否定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用于批判理性的统治，而且用于分析和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所出现的越来越物化的大众文化。这种由“文化产业”所控制的大众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和齐一性的特点，长期消费这些商品会造成大众想象力和自发性的匮乏，从而阻碍独立自主个体的发展并

①朱文琦. 新时代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②《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5.

③[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557.

④[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56.

导致对现实的服从。^①因此从功能的角度——是否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法兰克福学派将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技术理性等都看作是意识形态。^②

其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马克思的实践性观点出发，他认为意识形态体现的不是人对世界的认知关系，而是对人与世界真实关系的想象性再现，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思想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情感、形象和本能反应与体验的问题，是“社会的历史的一种基本结构”，即一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结构。^③这种出于社会心理与物质实践角度的阐述丰富了意识形态的概念。

其五，当代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和乔治·拉伦倾向于主张“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④以及意识形态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再他们看来，那里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哪里就存在统治和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即用来维护阶级统治，又用来维护种族群体之间、国家之间、性别之间等各种统治关系。这种观点为当代意识形态类型的多样化提供了概念基础。

1.2.1.3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属性的研究

阿尔都塞在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之后，就将媒体纳入了意识形态范畴，随着网络技术和经济发展，西方学者也逐渐开始分析网络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曼纽尔·卡斯特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网络社会的产生，相较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网络社会的话语传播更依赖于网络媒体渠道，在此影响下，传统意识形态也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发展，并借此传播。^⑤埃瑟·戴森指出，网络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且也可以作为政治工具使用。^⑥劳伦斯·莱斯格认为，网络并不能成为使人们生活更平等的存在，相反，它会加大意识形态被政府控制的风险。因为网络作为一种工具，其管理权仍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正是由于这种被管理

① 张冰. 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关系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② [美] 马丁·杰.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③ [法]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4: 202.

④ [英] 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7.

⑤ [西]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576.

⑥ [美] 埃瑟·戴森著. 《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1998: 17.

的特性，使网络成了完美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①约翰·B·汤普森也指出，大众传媒改变的不仅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内容和功能。^②安德鲁·查威德克认为，网络是欧美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工具。^③阿尔温·托夫勒也指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与控制者将控制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走向。^④

1.2.2 国内研究现状

截至2023年3月，以“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有4273条，其中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3455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390篇，会议、报纸119篇，外文文献199篇，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2.2.1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

学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由于研究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对网络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定义，学界目前已有的定义有延伸说、体系说、价值说等，但从根本上看，可以将以上观点分为两类。一种是技术属性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延伸。如陈双泉、韩璞庚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再现，与现实意识形态相对应。^⑤赵惜群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并非网络空间中自发的意识形式和观念体系，而是社会意识形式在网络空间中的反映。^⑥另一种是社会属性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不同社会阶层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政治倾向的思想体系。如何茜认为，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反映的是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⑦郝保权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空间中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实质是用户主体通过反映社会关系构成的认知系统。^⑧张宽裕认为网络意识形态作为网民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诉求，指引着网民的行动，

①[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②[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7.

③[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5.

④[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5.

⑤陈双泉,韩璞庚.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治理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22(01).

⑥赵惜群.论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要素的促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04):193-195.

⑦何茜.西方文化渗透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03):55-63.

⑧郝保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趋势[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1):127-135+156.

并对现实意识形态具有能动作用，是意识形态的新范式。^①学界已有的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虽然有了量的基础，但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理论基础，对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仍然难以统一，且缺乏较为客观、全面的定义。

1.2.2.2 关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的研究

关于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杨洋认为，外部风险是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技术壁垒，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先进的技术对我国进行网络封锁，同时鼓吹宣传各种西方思潮，意图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内部则面临着各种自媒体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逐渐偏离主流意识价值导向。^②史献芝认为，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国家信息技术霸权、网络话语霸权、宗教文化的渗透、国内民众心态失衡的现状，构成了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焦点问题。^③潘庆华认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传播不实信息、抹黑政府和军队形象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难题。^④梳理学界已有的观点发现，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亟须破解的第一个难题是技术难题，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避免被他人“卡脖子”的窘境。^⑤其次，要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则必须将实践立足点放在国内的网络环境治理难题上，着眼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新体系、新格局。

1.2.2.3 关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的研究

针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学界提出的治理路径有以下几点。金国峰认为，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同时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创新，加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大众化程度；其次，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力度，同时要补充、完善立法，做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最后，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规范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⑥徐艳玲、孙其战提出，首先要正确疏导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诉求，重视民意表达，剖析舆论乱象，及时发布官方信息进行疏导；其次要加强对国内自媒体的管控，虽然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要用法律约束对制造、宣传不实信息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传播者；最后，要提高我国网民的

①张宽裕,丁振国.论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02):37-38.

②杨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9.

③史献芝.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7.

④潘庆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国防科技大学,2018.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⑥金国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辽宁大学,2017.

媒介素养,使其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最大变量”转为“最大增量”。^①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事关国家安全。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有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供参考,众多学者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内国外、技术难题、净化网络空间、加快相关立法、提高公民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治理策略,为我国解决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产生了诸多助力。

1.2.3 研究述评

1.2.3.1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外学者不仅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有相当透彻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不约而同地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具备了网络属性。他们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意识到它本身具有的思想塑造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和其因网络技术发展而具备的新特质和表现形式。其中大部分研究并未聚焦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而是重点关注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政府工具的思想控制功能,国外重视利用多种渠道、方式将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创新,主动契合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特质,使传统意识形态借助网络工具发挥思想教化、舆论控制的功能,这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我国也要基于中国实际重新研读国外的相关文献,警惕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

1.2.3.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从网络意识形态的定义上看,技术属性论出现在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初期,当时的互联网还未形成如今这般规模庞大的网络社会,网络环境也并不复杂,但如果仅从技术属性对网络意识形态下定义而忽略其社会属性,显然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内核。尽管网络意识形态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但其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文章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应该是兼备互联网的技术属性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是国家、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公民等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利益诉求在网络空间碰撞、交融、博弈后形成的思想体系,对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能动作用,对网络行为主体具有价值引领、观念塑造、行为导向的作用,是意识形态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来的新样态。

^①徐艳玲,孙其战.“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与破解策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06):95-104.

第二，关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治理路径上。国内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网络技术难题上，但对于公民在互联网现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相关研究较少。公民作为网络上的行为主体，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最大变量”，因此，必须将公民这个“最大变量”发展为“最大增量”，使其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治的一环。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论文在分析意识形态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上，综述前期国内外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成果，分析梳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以系统论为指导，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探寻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条件和动力机制，总结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和规律性特点，总体研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应该注意的方面。结合网络社会环境实际，提出网络意识形态全新界定，并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本质属性，以及结构功能等，从理论层面考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途径、目标多个维度，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治理体系；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等不同治理主体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施策略。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对论题的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论文研究中将采取以下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在论题研究过程中，本文搜集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包括意识形态概念、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时代意识形态传播特点等理论成果，归纳总结和借鉴当前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系统研究法。论文以新时代为视角研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对国际与国内的网络环境、网上与网下的行为主体、现实风险与预期目标等各要素进行考察，通过分析网络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和各个要素间的关系，找出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各个风险要素的解决措施。

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选题既是理论性的问题，又是实践性的问题，面对当前网络的快速发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现实问题，找出解决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行性路径。

1.4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1.4.1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前沿和主阵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也是进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重中之重。厘清相关概念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当前学界内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却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结合前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现有的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探究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认识既是本研究的重点又是难点。其次是关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研究主要从国家宏观政策，如完善立法、改进技术、提高管理效能方面展开分析，其研究各有侧重，但是防是治的基础，治是防的延伸，如何将防范和治理双向结合，齐驱并重，并借此铸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与治理双重体系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重点与难点。

1.4.2 研究的创新点

当前国内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相关研究，重点聚焦于提高相关部门管理效能、改进我国软件及硬件技术、完善立法等方面，或是将网络行为主体参与网络共治作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路径。但在网络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且具备网络属性，针对传统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措施已不足以完全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风险挑战。针对问题，论文不论是理论拓展还是应对策略创新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网络意识形态做出了系统的概念梳理和重新界定，这为本研究起到了夯基筑石的作用。其二，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使人民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量”，该观点可能为本论文的第二个创新之处。

2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相关理论阐述

2.1 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其作为上层建筑发挥作用的历史都要久于它作为研究对象进入人类研究视域的历史。但由于其特殊性，因此容易被作出狭隘的定义。具体而言，当意识形态与某个思想流派建立起联系，而恰巧这个思想流派的思想被批判或否定时，意识形态也常常被一同批判或否定。由于意识形态相关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让意识形态的涵义回归意识形态本身的重要性也不必言明。

2.1.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由希腊语观念（Idea）和逻各斯（Logos）构成，因此可将其直译为“观念的科学”。追溯意识形态的起源便不难发现，从埃菲斯学派开始，西方哲学先贤们便将研究的目光从世界的本原过渡到了人本身及人的精神世界上，而意识形态也开始闪烁理性的光辉。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理念世界”中“高贵的谎言”都触及到了意识形态的雏形。而学界公认意识形态一词是由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最早提出的，他在1796年的论文《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随后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①在此之后，尽管西方的众多思想家都开始穷尽对意识形态的探究，并试图对其做出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始终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马克思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这种“意识形态”是狭义的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它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倾向、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第二，广义的意识形态则意味观念的集合，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法律、文学、宗教、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文章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包括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

^①周瑜. 新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反映并由其决定，同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并在特定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

2.1.2 网络意识形态

学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由于研究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对网络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定义，学界目前已有的定义有延伸说、体系说、价值说等，但从根本上看，可以将以上观点分为两类。一种是技术属性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延伸。技术属性论立足于唯物史观，认为网络意识形态首先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通过网络平台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存在、经济关系的反映。但网络意识形态之所以冠以“网络”二字，绝非仅仅因为网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是恰恰相反。网络社交平台在进行信息传播功能时，已经开始自发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产生的意识形态是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各种思想观念汇集而成的，并且时而会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对抗。另一种是社会属性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不同社会阶层在网络空间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的总和。^①这种论断肯定了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属性，但网民仅仅是不同的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社交平台的统称，社会中并不存在“网民”阶级，网络意识形态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自发产生。因此，将网络意识形态视为与社会意识形态完全分离而独立存在的观点显然也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应该是兼备互联网的技术属性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是国家、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公民等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利益诉求在网络空间碰撞、交融、博弈后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以现实社会为基础，以网络平台为传播载体，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对网络行为主体具有价值引领、观念塑造、行为导向的作用。

2.1.3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谋求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势必明晰何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提到安全便时常伴随着风险一词，如政治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都有与其相对应的风险，因此文章首先就风险一词进行阐述。其一，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辞海》中将风险定义为遭受不

^①李亚妮, 郑子威.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治理思路研究[J]. 科技传播, 2021, 13(14):055.

利的可能性，可见，风险是可见、可知的，虽然风险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但提前做好应对相应风险的措施，即可使风险变为可知、可控的，遭受不利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其二，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危害。风险指的是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状态，导向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坏的。风险可能会带来危害，但也伴随着机遇。如果能妥善应对风险，则能使相应的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因此，可将风险视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不良结果的不确定性。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就是在网络社会中产生的，即可能会阻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良性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2.2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理论基础

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范畴，尽管具备了传统意识形态所不具备的网络属性和技术属性，但究其根本而言，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与内在核心。因此，如要探讨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则势必要以意识形态的理论为基础。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

2.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系统的表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更多的是针砭时弊的应景式批判或论述。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进行凝练便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意识形态”这一概念。

首先，基于批判当时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构成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来解释现实的思辨方式，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①并用“照相机成像”的例子说明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与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在“史前历史”这个不会受到“粗暴事实”干预的环境中自由释放思辨的欲望相反。恰巧是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它们的独立外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7.

观了。”^①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不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社会意识不具备自身单独的发展和历史，并修正了被唯心主义颠倒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唯心主义者将观念的主体视作观念的产物。这种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反而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都是由人类的思想所创造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歪曲，因此必然是虚假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意识既然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识形态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在观念上的表达，即“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处于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虚假地宣称为整个社会普遍的利益，并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来为他们生产这种特殊利益，此时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出的虚假性不是指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虚假的，而是指它掩盖了统治阶级为自身谋利的真实意图。

尽管意识形态并非由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他们也并未最早触及到意识形态的雏形。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在扬弃以往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上，已经科学地阐释了什么是意识形态。

2.2.1.2 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

列宁对意识形态的观点散落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摒弃了以往思想家们从否定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概念阐释，首次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列宁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表现出“虚假性”，是因为它服务于统治阶级，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权益为存在的，但无产阶级没有其特殊利益，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就是使生产关系不断进步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满足。因此，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其不仅可以正确反映社会存在，而且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提出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列宁认为，不存在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每个阶级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的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总和，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阶级社会中，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是其党性，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的全部利益就是使全人类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①因此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意识形态也就随之消失了。

第三，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先进的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作为构成社会主义意识的基础尚未完全产生。同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渗入到无产阶级当中。因此，只有当少数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意识作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对立的社会意识，并采取灌输的方式，通过劳动实践、劳动教育将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之中，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促进社会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②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2.2.2.1 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在著作和书信当中曾频繁地使用“思想体系”“观念”“认识”等词，而正式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是在《社会学大纲》的批注中。虽然毛泽东并未撰写专门的著作来对意识形态进行阐述，但其意识形态思想仍然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意识形态”做出了解释。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③虽然毛泽东在此处并未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这里的“文化”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同时对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具有能动作用，而社会政治是社会经济的集中表达。

在意识形态的功能上，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凝聚人心、指导方向的作用。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党来管理一切，而党能管理一切的

① 《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1.

②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7.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

基础是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肃清党内的右倾思想时再次指出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不可分割，“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

2.2.2.2 邓小平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观集中体现在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中。首先，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为后续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经济建设是核心，只有坚持物质文明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如果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物质文明建设的步伐，就不能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表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不仅对物质文明的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并且能使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时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②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需要，大力培养“四有公民”。

2.2.2.3 江泽民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新时代的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治理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做好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我国发展的美好期望做出了回应，而且立足马列主义做出了理论创新，给出了如何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回答。

首先，要正确认识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必须指出，对两个文明的关系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认识的正确不正确、处理的好不好，是一个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全局性问题。”^①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之中，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重要、紧迫。江泽民认为，只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是畸形的社会，社会文明应当既包括物质文明，又包括精神文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②之所以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是因为仍然存在为求经济发展牺牲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对此，江泽民表示要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对“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③全面理解两个文明的关系。

其次，对内要防止不良思想的滋生，对外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过长期探索取得的成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同时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在发展过程中，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反映在了人们的思想当中，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诱发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④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西方的不良思潮也纷至沓来，在看到我国经济不断取得良好成绩之后，一些西方国家趁机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国进行入侵、渗透，企图达到分化我国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⑤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贻误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们就会犯历史性错误。”^⑥对内对外都要坚决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

最后，要重视运用网络技术进行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在全党的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⑦江泽民认为，思想宣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等灌输到群众中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外部有企图对我国进行分化的西方国家，对内享乐主义、

①《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5.

②《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2.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04.

④《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3.

⑤《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3.

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4.

⑦《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6.

拜金主义滋长蔓延，因此，如何正确使用网络技术，使思想工作与网络技术相结合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因此，我国的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①同时，要学习网络知识、发展网络技术，主动拓宽我国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渠道，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影响力不断提高。时至今日，这一观点对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2.4 胡锦涛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

二十世纪初，基于我国的发展状况和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胡锦涛深刻认识到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②同时要“主动掌握网络舆论引导话语权，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主流思想文化的阵地作用。”^③并在以往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基础之上，结合当代网络快速发展的现实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网络意识形态观。

首先，要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意识形态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搞不好就会出大问题。虽然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域总体势头良好，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各种非马思潮也在悄然滋生，其中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④如果不对此采取有效措施，轻则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进程，重则会动摇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危及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必须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意识形态工作”。^⑤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载体，提高政府部门的舆论引导能力，加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从而“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⑥

其次，创造性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⑦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继承自中国共产党人关

①《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7.

②《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7.

③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08(01).

④《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7.

⑤《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8.

⑥《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28.

⑦《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6.

于谋求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强调，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①其中精神文明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唱响主旋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进一步提高新闻宣传工作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最后，要加强网络文化管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互联网的产生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同时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指出，要“引导群众在网络社会中自我教育、自我表现，自我提升，以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提升文化整体竞争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等举措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②互联网作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对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要利用互联网先进技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2.2.2.5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问题的重要论述

当前我国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但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③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④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和波谲云诡的意识形态斗争，如何做好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对此，习近平立足于我国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观点，做出了新的规划和总体布局。

第一，要加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龚自珍曾说过“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⑤意识形态作为立国修史的依据，在世界各个文

①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2.

②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7.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6.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⑤ 龚自珍.《定庵续集》（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无不作为主导性力量存在。对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行探究即可发现，意识形态就是统治意识和话语霸权。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分化和整合期，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各种建构方案和价值观竞相角逐的战场，而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实质即为不同社会制度之争。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好思想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增加社会凝聚力。

第二，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参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①“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精华，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满足了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都做出了要求。因此必须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第三，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平台已经成为当前的“草野”，而网民们则是“知政失”的“草根”。习近平强调，“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④网络社交平台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到丰沛的、不同的信息。但与此同时，网络社交平台也滋生了各种“非马”“反马”思潮，“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⑤因此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鼓吹推翻我国政权、煽动祖国分裂要坚决反击；面对利用网络进行人身攻击、散布不实消息的行为要严管到底。在网络环境治理问题上，“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1.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③ 王充.《论衡》（卷二十八）[M]. 湖南：岳麓书社. 2006.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36.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6.

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①为全国人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3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部分，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必备条件，更承载着人民幸福生活的殷切期盼，因此，必须以豪迈的姿态和一往无前的决心，坚定不移守卫我国网络空间的主权，维护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2.3.1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③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则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中之重，因此，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已经从线下空转移到了网络空间、从传统安全转移到了非传统安全，但始终不变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便横亘至今的争斗。自从十月革命为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我国便稳步昂首阔步向着社会主义的理想王国前进，但网络技术的产生不仅加快了我国的发展进程，也加剧了网络空间中“看不见的硝烟。”对内，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尚未有官方、统一的界定，相关的理论成果尚不足以完全解决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在矛盾。对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对我国实行网络封锁、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已是“司马昭之心”。因此，必须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主动抵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2.3.2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社会稳定

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规定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属性，同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7.

②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6.

③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社会当中倡导什么、杜绝什么、信仰什么。网络空间自诞生以来便与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一经出现便首先网络中引起广泛讨论和热议，而网络空间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相关讨论一旦失控，便会从网络舆论向群体政治性事件转化、从网络空间转向线下社会转化。由此可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意义不言自明。因此，不仅要与线下社会中的现实困境作斗争、不断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更要以社会安全、稳定为保障，走中国特色和国家安全道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2.3.3 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人民幸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时代，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历史任务，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改变。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和灌输机制，同时改变了人们表达诉求、抒发民意的途径。“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①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社会为参照和基础并在网络空间中反映出来的，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乌烟瘴气，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人们才能在使用网络技术的同时使网络空间发挥正向反馈的作用，才能做到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权益。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36.

3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

当前网络社会中,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国家对我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意图也已经昭然若揭。种种现象都对我国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坚守网络意识形态阵地造成了阻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①因此,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认识到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洞察西方国家借由网络向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行径,明晰我国网络技术发展中受制于人的难题,透视我国在网络法治化进程中法律不够全面、完备的现状。

3.1 网络技术的依附风险

任意先进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会使社会实现跃迁式发展,网络技术也不例外。自互联网技术产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便深受其利,但要意识到我国在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业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西方的技术优势我国绝不能否定或回避互联网技术敌强我弱的格局,而应严肃对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信息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3.1.1 西方国家实施网络技术封锁

自互联网技术产生以来,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美国手中,而我国对于美国的互联网技术也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集中体现在互联网的工作机理上。IPV4根服务器作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在全球共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位于美国,剩余的12个辅根服务器中有9个位于美国,剩余三个分别位于英国、瑞典、日本。IPV4根服务器主要用于解析互联网的顶级域名,对于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行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有唯一的IPV4主根服务器,因此所有的根服务器在管理互联网通信、解析标准域名、数据库的传输与缓存的过程中均需要美国的ICANN机构授权管理。除此之外,美国还掌握了互联网最底层的基建也就是“IOE”三家企业,“I”即“IBM”负责提供服务器,;

^①《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3.

“O”即“ORACLE”甲骨文，负责提供数据库支持；“EMC”负责提供存储设备，这三家企业构成了互联网世界的地基，任何网络平台的搭建都需要以上三家企业的技术支持。

例如在俄乌冲突期间，西方发布舆论战，不断渲染俄罗斯战败，推特上甚至出现了“俄罗斯战败”的热点话题。随后，美国便暂停了甲骨文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并掐断了俄罗斯的互联网发声渠道。这使得俄罗斯所有地区出现了网络瘫痪、社交媒体停用、IPHONE手机在俄罗斯无法进行软件更新和移动支付功能的局面。因此尽管并未出现俄罗斯战败的事实，但俄罗斯也难以在网络平台澄清真相。

由于互联网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也一直扮演着网络空间的规则制定者角色。互联网技术就其工具属性而言，应当是中立的，可以为任何国家所用，但就其政治属性而言，又一直带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偏好。因此，对于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持有者和网络空间政策规则制定者的美国来说，对别国实施技术霸权并非一件难事。

3.1.2 我国网络技术自主创新不足

从网络技术诞生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交融程度就越来越深，在网络技术推动我国发展过程当中，诸多问题也开始显现，其中之一便是互联网领域技术需求过剩但产能不足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网络技术自主创新不足。2021年我国GDP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实际增速3.0%。^①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无不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优越性，但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核心科技、精密元器件、高端芯片等技术领域自主创新不足的短板也逐渐显现。

以芯片生产为例。我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随着各类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芯片供给却严重不足，高端芯片却仍然需要向美国大量采购，发达国家把持着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致使我国在端口高端芯片上的进口费用逐年递增。据联合国贸易数据统计库显示，我国2010至2020年在芯片贸易上持续存在贸易逆差，2020年更是高达2329亿美元。^②这反映出我国芯片行业不仅对国外

^①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N]. 人民日报, 2023-03-01(009). DOI:10.28655/n.cnki.nrmrb.2023.002162.

^②陈中妹. 中国在全球芯片产业贸易网络的地位及困境研究[D]. 吉林大学, 2022.

进口存在着高度依赖，并且在国内生产供给上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

在 EDA 工具的购买和使用上同样如此。EDA 工具作为芯片研发、设计、测试的关键工具，始终被美国的新思科技、铿腾电子、明导科技三家企业垄断。而我国的 EDA 工具研发企业无论是在工艺水平还是技术创新上，都难以与这三家巨头比肩，这就导致我国在芯片研发、生产、测绘中始终受制于美国，而一旦美国的 EDA 企业停止对中国的授权使用，我国的芯片生产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除此以外，芯片生产所需的光刻机也完全依赖进口，在有光刻机生产能力的荷兰 ASML、韩国三星、日本尼康三家企业中，荷兰的 ASML 由于《瓦森那协定》而禁止向中国出售高端极紫光刻机，这就导致当前世界光刻机先进水平已经达到 7nm，我国却仍处于 90nm。而如果我国不能打破当前的技术创新不足的困境，我国网络技术发展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3.1.3 我国网络技术人才数量短缺

在网络技术领域当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①一方面，我国网络素质教育的力度有待提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教育教师队伍配置不到位、网络技术学科设置不完善、网络教育投入资金不充裕等。网络安全并非仅仅针对国家而言，网络技术也并非专业人员的专属技能，网络安全和网络技术都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只是将计算机科学技术纳入大学的学科设置当中，在社会面和大多数中小学都并未开设专门的网络技术课程。这导致人们对网络技术的认知程度低，仅仅将其视为使生活方便快捷的工具，这无疑窄化了网络技术的内涵与外延。无论从何种程度说，网络技术作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其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都应该被人民所了解。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网络素养和知识，导致人民在网络技术使用过程中出现种种不规范行为，同时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知识盲区而诱发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非法言论等问题，从而使人民出现“谈网络色变”的现象，使网络技术被逐渐污名化。这不但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埋下了隐患，同时也加剧了网络技术人才培养的难度。

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人才库资源匮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不仅需要

^①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对网络意识形态有正确的认知，还需要参与网络生活每个方面的人都具备相关的网络知识。政府工作人员、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队伍、网络技术人才都需要具备网络技术知识。但当前我国由于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网络技术人才培养系统，导致网络技术人才资源库匮乏。政府在公布网络信息、整治网络环境、解决网络难题时缺少专业的技术人才，只能照搬传统意识形态治理方案；宣传队伍在网络空间进行主旋律传播时缺乏运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经验，导致网络阵地难以坚守；而一些网络企业面对培养专业人才和研发新兴技术漫长周期，宁愿高价买入国外技术、引进人才，也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自主研发上；一些网络大V、意见领袖难以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诱惑，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这些都导致我国网络技术人才库资源匮乏，如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甚至会导致网络治理队伍难堪大用的情况。

网络时代中，科学技术是核心，人才队伍是根本。创新技术与人才培养是维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因此，必须着力推进互联网领域自主创新技术的研发，推动先进的技术向科技成果转化；同时要大力培养专业人才，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供人才队伍保障，避免陷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无人可用的境地。

3.2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风险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网络用户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文明，但同时也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网络空间向我国宣传西式的“普世价值”以及各种社会思潮打开了方便之门，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否定别国的文化价值，并通过各类非马克思主义和错误的社会思潮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①因此，必须警惕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

3.2.1 利用先进技术谋求网络话语霸权

技术本身不具备立场，但是使用技术的国家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表现在贸易往来上，在文化传播上也同样如此。网络话语霸权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先进的技术在网络空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间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优势，在思想观念、话语体系、政治制度上对别国进行渗透、入侵，从而实现和平演变目的的手段。而美国凭借网络技术上的优势，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网络国家安全的规则制定者，还想通过垄断网络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实施网络话语霸权。

美国作为最早研发和使用网络技术的国家之一，开发应用各类办公和社交软件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众多用户，在谋求网络话语霸权上具备天然的优势。其一，在网络上，如办公软件微软、搜索引擎谷歌、社交工具 Face book 和 Twitter、视频播放平台 You tube 等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使用者。这为美国宣传本国的思想文化和新闻信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美国不仅利用网络媒介大肆鼓吹自己的文化价值，还通过封锁别国信息和抹黑别国形象的手段，将自己修饰为富强、先进的代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成了落后衰败的代名词。其二，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语言上，无论是新闻发布还是程序编码，都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同时美国作为网络技术的发源地，这就决定了英语基本上成为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的官方语言。语言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最古老、最常用的传播方式，而当前国际范围内，无论是国际社交平台还是指明新闻社，均使用英语作为对外话语传播的统一用语，这不仅加大了汉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样挤兑了以汉语为官方用语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音量”。

从表面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动网络媒体的发展是为了彰显自身的科技实力，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网络话语霸权和国家利益，向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相较于长枪短炮式的国家争斗，以看不见硝烟的方式在网络空间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信息殖民无疑危害更深远。

3.2.2 通过境外组织培养网络代理人

当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看到了网络空间传播意识形态和各类社会思潮的便捷性，将各种与我国主旋律不符的声音裹挟其中，通过培养网络代理人来对我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妄图借此制造“颜色革命”。

美国在网上培养网络代理人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通过资本供给的方式，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策反为帮美国发声的“麦克风”。如在 2020 年春节武汉封城抗疫期间，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撰写了《方方日记》一书，书中大肆抨击中国政府抗疫不力和为求抗疫不顾民生，却丝毫不提在此期

间我国扛抗疫的种种举措和取得的成果。而在 2022 年 4 月 8 日,《方方日记》不仅余波未平,甚至在哈伯柯林斯(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社公开出版,其后在亚马逊网站全网售卖。《方方日记》在短短十多天就完成了网络传播、翻译、校对、宣传和出版,光速出版的背后也表明反华势力妄图抹杀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抗疫努力的野心昭然若揭。除此之外,美国国际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我国的一些“公知”,来扩大这些“公知”网络影响力。这些人自认为看清了社会,对既定事实进行加工之后的“二次创作”,他们打着为中国谋发展的幌子,却掩盖不了为西方敌对势力发声的事实。

其二,通过学术活动占据我国理论高地。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的学术交流也日趋频繁,各国文化成果的传播不仅推动了理论界的学术发展,也为西方敌对势力宣传其价值观念创造了条件。一些国家借学术交流之名,在学术交流期间对一些学者灌输的知识概念大多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这些知识、理念通过学术活动和网络传播的方式传入中国,在学术界占据了一定地位,甚至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开始以西方学说作为评判中国实践问题的价值依据。这些学者全然不知这些文化输出手段背后的政治意图,反而成了美国在网络中培养的“网络代理人”,而这种意识形态传播更为隐蔽的同时冲击力也更胜以往。

3.2.3 输出西方文化进行信息殖民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新的政治诉求和多元社会思潮也随之产生。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宽了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传播的路径,美国看准时机,趁机向我国输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非马和反马思潮,试图破坏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动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借此进行信息殖民战略。

当前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本身并非都持反马立场,但在美国的刻意包装和宣传之下,这些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美国利用文化渗透进行信息殖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将美国文化价值注入银幕作品、文学作品、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当中,其中充斥着英雄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美国宣称的“自由、平等、人权、自由”的普

世价值，一些不具备信息辨别能力的网民在这个过程中极易被蛊惑，而被发展成为美国文化的忠实拥趸。其二，利用各类社会思潮进行信息殖民。例如借拨正历史为名却以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为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活在当下、娱乐至死的泛娱乐主义；曲解伊壁鸠鲁学派的享乐主义等等。这些社会思潮对我国网民，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塑造的青少年来说荼毒至深。美国借“文化自由”之名，向我国输入各种非马、反马思潮，其真实目的是让我国网民在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渐渐抛弃、否定我国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等。

美国通过“全面网络自由战略”使我国被迫接收美国的文化价值，其以文化自由为借口而进行信息殖民，但这种“自由”则是建立在网络技术霸权和网络话语霸权之上的双标的“自由”。他们重点关注我国社会的“阴暗面”，利用社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挑起非理性情绪，美国以信息殖民的方式不仅消解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

3.3 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语风险

网络时代自由的话语表达和丰富的信息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兼收并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网民夹杂着非理性情绪的话语表达、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都在消解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同时，面临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程度相形见绌，宏大的话语叙述也与网络时代“流量为王”的需求不符，这些都构成了阻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桎梏。

3.3.1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正面形象受到攻击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争，随着西方率先在网络技术领域的开疆扩土，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逐渐向网络空间蔓延。美国将污名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进一步贬低我国国际形态、打击我国发展的一项战略，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正面形象的抹黑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同时，处于市场经济各个环节的经济人站在资本逐利的角度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忽视国家利益和精神世界的

建构，一旦自身的物质利益未得到充分满足，就对主流意识形态心生怨怼；更有一些网络文化机构，以抹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等方式树立自己“讲真话”的耿直人设，借此获取流量并转化为物质利益。这种经济因素造成的非理性情绪在网络社会迅速传播，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更多人抹黑对国主流意识形态，更有甚者将其上升为对我国社会制度和道路的质疑，种种不和谐的声音最终演变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

第二，政治方面。当前由于网络社会中立体化、全方位的信息传播，使不同的人对统一社会事件讨论的声音得以迅速传播，这也使一些社会事件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而本身普通的社会事件则由于舆论引导逐步衍生成“社会热点事件”。我国在网络生态环境的治理还在攻坚当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但一些网民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难以辨别这些网络言论背后的政治意图，极易被敌对势力蛊惑，发出众多裹挟着抨击政府职能部门治网不力的论断，这些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和点评在网络社会和线下社会产生“共振”，不断削减我国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美国通过我国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处于社会转型期衍生出的社会矛盾进行大肆渲染，并通过舆论引导将其归咎于我国道路、制度存在缺陷，以此来衬托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并进一步削减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解释力，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形象不断遭受打击。

3.3.2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领导力遭到争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主流媒体进行传播，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此时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主流媒体在这里不仅是话语传播的“把关人”，同时也起着对人们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但网络社会的产生打破了这种格局，人们在网络社会中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这种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遭到西方势力的争夺。

当前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全平台的传播尚未完全完成，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被一些媒体侵占、抢夺。首先，我国在网络资源的整合上还存在不足。网络平台不仅是网民们抒发民意的平台，同时也可

以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平台。当前网络空间中，各类社交平台各有其自身的传播优势，如短视频传播、图文传播、音频制作等都有不同的传播特点。但我国尚未实现对网络媒体的资源整合，无法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合力使主流意识形态做到全网覆盖。这不仅会导致网民在不同平台会接收到相互矛盾的信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导致网络空间中杂音过多，成为滋生各种不良信息的温床。其次，我国官方媒体的网络建设力度不足，导致网络议题不集中。目前我国官方媒体主要通过“两微一端”进行官方信息的网络传播。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涌入我国网民的视野当中。而在官方媒体尚未驻足之处，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不绝于耳；此外，官方媒体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时效稍微滞后，这就给了一些破坏社会安定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对我党和政府进行造谣抹黑，大肆传播“阴谋论”，这些非法言论占据了舆论高地，不仅阻碍了真相的公布，也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

3.3.3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体系创新不足

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宣讲内容，都尚未完全结合网络技术的发展，具备正向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的文章由于宏大的叙事风格，在信息时代传播速度和广度难以达到理想的预期。而西方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传教士一样的传播，而是充分融合进各种西方文化产品当中，契合当前网络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特点，占据了网民的视野，充分渗透进了我国民众的文化生活。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网络失语风险，这表现在：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创新不足。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品质是理论创新，但当前我国网络空间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还是局限于文本内容。此外，官方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不够通俗易懂，在理论解读和信息公布过程中还存在“背教案”现象，并未根据发布信息的渠道、平台不同而将话语内容做出相应调整。只有将主流意识形态转换为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角度分别作出切实可行的要求和解释，这时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地“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不是“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创新不足。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站在国家角

度上实现对公民的价值导向、目标引领、实践赋能作用，而且要能以情动人，重视公民的切身利益，使公民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心理共鸣。这就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在话语逻辑上要有所创新，能切合公民的实际情况和利益需求，同时还要求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结构和话语形式平易近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进驻网络空间，开通了官方媒体账号，但传播方式还停留在生硬、严肃的政治层面，与网络话语诙谐幽默、平易近人的风格大相径庭，这也导致网民难以对其产生亲近感，传播效力自然大打折扣，也弱化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意识共识。

3.4 网络意识形态微舆情失控风险

当前我国网络空间舆情主要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现象展开，其中一部分舆论内容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特点，表现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宣泄情绪。在网络社会产生之前，社会舆论在线下只能小范围传播，但网络技术的赋权使网络中每个行为个体都能通过社会动员掀起网络舆论风暴，各类社交媒体丰富了网络舆情传播的路径，巨量的网络信息丰富了网络舆情的议题。传统条件下一些主流媒体可以控制的舆论风暴和矛盾冲突在网络社会中极易引发成为群体政治事件，并在管制失控之后破坏政府的舆论引导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3.4.1 舆情监控与反馈机制不完备

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纷至沓来的网络信息都给我国网络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国不仅在技术上面临受制于人的窘境，网络生态环境也不容乐观。随着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网络问政成了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手段、新举措，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尚不完备的问题则显得尤为严峻。

一方面，政府舆情监控能力不足，网络信息一经发布就会在网络空间自行传播，如果社会事件无法在产生初期被合理解决，就会产生难以控制的社会舆论风暴。当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对敏感词汇进行屏蔽来实现对网络言论的监控，但在推特、Face book 等国外社交软件上，我国无法对破坏网络环境和抹黑我国形象的言论进行监控，而有一部分人在国外社交软件上充当起中国社会事件“解说员”，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或政治举措的讨论名为解读事件本身，却贯

穿着引导不良舆论的目的；在国内媒体上，一些不法分子则开始利用制作视频、谐音的方式，逃避网络监管，他们自诩“清醒者”身份，以“还社会事件真相”为名，对我国政府施加执政压力。我国虽然利用主流媒体充当网络把关人的角色过滤掉了大部分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网络生态环境的不良信息，但对音频、视频的监管以及各个社交平台对个人不良言论的审核还不够严格。

另一方面，政府舆情反馈延迟较长，导致社会事件的结果被恶意解读，政府公信力下降。网络赋权是每个网民都拥有了话语输出的“麦克风”并极大助长了网民们的参政热情，其中对一些社会事件的讨论本质上并不构成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但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进度跟不上网民的讨论热度，导致社会事件的真相在还未公布时就被以讹传讹，最终导致社会舆论直指政府执政不力，网络舆论也上升到政治层面。

3.4.2 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产生，我国的网络立法也一直深入推进。但已有的法律体系还不能完全解决网络空间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网络本身具备的匿名性特征，更加大了我国网络法治化进程的难度。

其一，当前我国立法的效率有待提高。当前我国最快的立法周期为两年，^①但相较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层出不穷的网络乱象，我国的立法效率还有待提高，这就导致已经出现的网络不良言论和非法行为尚未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而当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出现时，新的网络乱象则又产生了。这就使网络生态环境的治理陷入了一个怪圈。其二，网络审核制度有待健全。文化产业的发展借网络技术的东风得以更上一层楼，但随之产生了一些“灰色地带”，例如美国通过投资我国影视剧行业，将西方意识形态裹挟其中。对这些文化产品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任其发展。因此，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使“灰色地带”转变为红色地带，则要求我国健全当前的网络审核制度。

3.4.3 网络行为主体的失范言行频发

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打开了公民获取信息和抒发民意的渠道，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与此同时，我国网民对事实的接受让位于主观情感，根据自己的好恶对

^①吴志攀.“互联网+”的兴起与法律的滞后性[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3):40.

信息进行主观性解读。其网络视野的宽度加大的同时，深度也逐渐变浅，在提取客观信息时主观先行，对不感兴趣的信息主动过滤，自行设置了一层认知屏障，而在言论表达时又过分倚重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偏好，从而导致自身网络失范言行频发。

首先，网民过当的“言论自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国公民过度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为名，毫无节制地宣泄自己的主观情绪，在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上不加思考，人云亦云，甚至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大肆将矛头指向我国的道路和制度问题，言论中充斥着反马色彩。殊不知，自由应该是有节制的自由，而不是无度的自由。

其次，我国网民的网络责任感不强，主人翁意识淡漠。主流意识形态不只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我国网民尚未较深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要意义，而只是将其作为教条化的理论知识，在实际生活中不能用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实践，导致政治站位、立场态度上极易被西方媒体蛊惑，从而发表示范言论、做出失范行为。

最后，我国网民基数大，但整体素质还有提高。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不能明辨真伪，因此在话语输出时难以掌握话语主动权，从而被一些网络大V煽动，制造社会舆论。网络社会不仅要求我国网民具备网络技术的使用能力，同时要求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信息收集和辨别能力，在进行话语输出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态度，做出正确理智的话语表达；在信息接收时，要擦亮眼睛，秉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愚的原则，不能全信也不能偏信，从而避免错误的话语理解和价值判断。

4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与治理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工作对我国有着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对内，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作用，打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环境；对外能有效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入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控和治理路径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对保障人民生活幸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推动国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守好网络安全技术命门

互联网在改变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对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对此我国必须坚持因时而变，随世而至，充分利用好网络技术这把双刃剑来提高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效能，维护网络安全。

4.1.1 发挥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每一个历史时期，科技的创新都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网络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是我国进入数字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的各个行业和每个领域都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应用。因此，毫无疑问，网络技术也将使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进入新的时代。而将网络技术运用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全过程，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战略机遇，必须找准网络技术的优势，同时契合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战略要求。

首先，以丰富的数据信息契合多元主体的需要。通过脸谱分析技术，在网络空间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为其提供多样的数据信息，打破地域、时空的限制，做到网络空间中不同的社交群体之间信息共享，据此整合网络意识形态，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实现资源统筹，形成政府主导、网民参与、协同共治的网络治理格局。其次，以快捷的传播特性契合网络治理的时效性。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不仅需要多元互动、齐心协力，同时需要在网络舆论发生时以各个主流媒体为单位快速发布官方通告和相关信息，相关部门要对有关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始终快于网络舆论散播的速度，不仅有利于增强

政府的公信力，占据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同时能降低网络舆情上升为群体政治性事件的风险。最后，以深层次数据挖掘实现网络行为主体的精确定位。网络技术通过 IP 地位、信任凭证授权等手段不仅可以获取网络行为主体的信息偏好程度，同时可以计算出每个用户的用户画像，对其年龄段、职业等进行分析。通过对个人信息的追溯可以呈现出每个网络用户的思想情感偏好，这不仅有助于针对不同的人群实现精准的信息推送，对其思想观念进行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引导，而且有助于第一时间定位网络环境破坏者，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保证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针对性。这不仅顺应了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符合应对网络全球化的趋势、维护我国网络领域主权和安全的战略要求。

4.1.2 推进网络技术自主创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合力、齐抓共管，不仅需要政府强力管控、主流意识形态高效引导，还需要自主研发的创新科技加持，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善治，形成治理合力。而网络技术不仅是我国网络安全的核心命门和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我国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尺。“近些年，我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投的钱不少，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①因此，必须意识到我国在网络技术应用和创新上的短板，加快推进网络技术自主研发创新，打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

首先，政府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在网络技术的研发创新中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大力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要站在促进长久、良性发展的角度统筹规划网络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做好技术创新的战略布局。其次，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经验。在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对我国形成的掣肘，对照并发现我国网络技术中的不足，同时汲取经验，从技术、硬件方面深入分析，加快补齐网络技术创新的短板。最后，互联网行业要通力合作，强强联合。我国互联网行业并非没有实现科技创新的实力，但当前一些企业以资本逐利为导向，奉行拿来主义，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先买入后垄断，抢

^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1.

占互联网行业市场份额，导致一些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中小型互联网新兴企业难以生存，最终致使我国网络技术创新难以维系。因此必须整合现有的互联网行业资源，加大各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以国家长远发展为首要目标，通力合作，打破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垄断局面，为网络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网络核心技术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们就随时面临着被人“卡脖子”的风险，因此必须要以过硬的网络技术建设网络强国，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4.1.3 培育综合素质强的网络工作队伍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仅要求我国意识形态内容过硬，能正面抵御外来风险，同时要有一批具备意识形态知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还要能掌握并熟练使用互联网技术的素质过硬的网络人才。

首先，加快正确指导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队伍建设。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治理工作，这要求领导队伍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在网络空间中准确、迅速地找到可能造成重大舆论的信息；还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明确的理想自信，自觉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贯彻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始终，在泥沙俱下的网络舆论场中守住初心，不被蛊惑。

其次，加快持续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队伍建设。单纯依靠网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念进行自发宣传具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网民个人账户的体量、声量、流量都难以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稳定、持续宣传输出。因此，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术界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等高素质、高学历群体主动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当中，形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宣传阵地，培养一支个人素质过硬、知识储备丰富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队伍。

最后，加快网络技术与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教育系统中，要着手培养一批兼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新闻媒体与传播知识、网络技术使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中，不需要只会在理论层面纸上谈兵的“书生”，也不需要只会使用网络技术的“工兵”。因此必须加大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力度，组织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真信真懂真用、对网络技术会用活用善用、对新闻舆论先知晓、先引导、先发声的人才队伍。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工作当中，必须掌握人才资源，否则就会陷入“空有宝山，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因此，必须从领导工作、宣传工作、技术使用等方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快我国智库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人才支持和队伍保障。

4.2 应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本质上而言，西方和我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可以看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只要两种制度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消亡。而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侵蚀、打击，必须严阵以待；同时，也要看到其弱点、痛点，西方国家之所以今年加大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力度，无非是因为我国的发展已经严重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因此，必须认清西方国家各种意识形态渗透手段的目的、途径、作用机理，在防护措施上打好组合拳。对内，培养姓马的网络代理人和意见领袖，让他们成为传播“中国好声音”的传声筒、西方丑恶行径的“照妖镜”；对外，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故事”。

4.2.1 揭露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目的

网络空间中西方社会思潮的侵入已经是学界共识，美国通过宣传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进行意识形态入侵。他们深谙网络舆论战对我国网络安全的破坏，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因此，对网络空间中动摇我国执政根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社会思潮和非法言论不能仅仅辟谣了之，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反驳，要深入透彻地剖析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网络空间腐蚀公众理想信念、破坏网络空间环境的作用机理和过程诱因讲清楚，深化我国公民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正确认知。

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要守住红色地带，占领灰色地带，打入黑色地带。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红色、灰色、黑色地带，随着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的阵地意识逐渐加强，红色地带也在不断扩张。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国的博弈从未停止，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

人民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为外来文化和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创造了条件，推动着黑色地带的滋生和蔓延。对此，我们要坚持唱响主旋律，发挥正能量，要坚定不移守住红色地带，大刀阔斧占领灰色地带，敢于亮剑打入黑色地带，消灭各种西方不正确社会思潮滋生的泥沼。

另一方面，认清网络空间中纷繁复杂的各类思想和信息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础。“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如果不在认知上对网络空间中众多的社会思潮形成正确的认识判断，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理想、丧失信念。必须看清各种社会思潮和网络信息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意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就是意识形态风险。^②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入侵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我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颠覆我国的社会制度。因此，必须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对西方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进行审视、揭露、批判、抨击，对西方国家文化输出手段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行揭示，在国际上敲响警钟、获得共鸣，在国内加强公民的政治觉悟、引起重视，在各方面打好组合拳，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进行有力的回击。

4.2.2 培育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网络代理人

网络空间中虚实信息傍地同行，西方通过扶植意见领袖来进行舆论引导、议题设置，这些泥沙俱下的信息经过意见领袖的刻意传播如若置之不理，便会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暴。因此必须重塑信息把关人角色，培育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网络代理人。网络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党管、党治，加强党对网络代理人的统一领导，确保网络言论的方向正确性。

首先，发挥网络代理人的议题设置功能。网络代理人作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网络舆情的引导者、网络环境的监控者，必须坚定政治立场，承担主体责任，把握网络空间舆情发酵的时、效、度。尤其是事关重大政治方针政策的解读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公布，必须保证信息发布在党的领导下层层递进、系统推进。网络代理人不仅要在网络空间中主动设置公共议题，而且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要主动与网民对接，及时摸清网民的真实意愿，并设置专门的议题进行讨论、意见搜集，引导我国网民理性参与网络话题讨论、合理表达诉求，在对

^①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26.

^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75.

通论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后及时向网络治理部门反映，避免网民被西方的意见领袖设置的容易引起舆论风险的网络议题引导。

其次，针对不同阶级的网民量身打造网络意识形态“灌输”方案。列宁曾经提出，先进的意识形态不会在劳动人民中自发产生，一定是由精英阶层率先发现并向劳动人民“灌输”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网络社会由于匿名性，导致网民的阶级属性十分模糊，但模糊并非消除，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关注人数多、话题热度高、讨论范围广的热点词、关键词进行汇总和分类，分析出不同的话题背后参与讨论的主要群体。通过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在不同的热点话题讨论社区设置专门的网络代理人，对该讨论社区的网民进行有度、有序的引导。通过针对不同阶级的网民关注社会问题区域的不同，进行不同话语内容在网络空间的投送，以此保证每个网民都能获得最适合自身情况的网络意识形态“灌输”方案，使每个网民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网络代理人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对网络空间善治的“最大增量”作用。

最后，设置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网络代理人。网络空间中的自媒体和大V自然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但主流官方媒体、新闻发言人、政府人员作为官方形象更应自觉担当起网络代理人的工作。政府人员在工作中应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事件中的问题，并总结出实践经验，以实际效果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新闻发言人在进行官方发言时应主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不良的网络舆论、社会思潮进行回应、反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形象；主流官方媒体应主动在网络空间中坚守舆论阵地，守住舆论场。除了在“两微一端”设置网络代理人以外，在任何网络社区都应该设置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网络代理人，做到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全覆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社区的广泛传播、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在网络空间中广扩散。

网络空间作为继陆地、海洋、天空之后的第四大空间，如果我们不主动占领，就会被别人率先占据。设置马克思主义的网络代理人不仅是在网络空间宣示主权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凝聚网民共识、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关键一步。因此，必须在网络空间设置为马克思主义发声的网络代理人，引导公民自觉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内容和价值主张，积极主动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同一切污名化马克思主义、唱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道

路的不和谐音调作斗争。

4.2.3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阐述着一个客观事实：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并以此作为载体，一国的文化实力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意识形态强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联结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不仅有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作用，更能凝聚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力量。因此，面对各类社会思潮和信息的涌入，必须立足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其一，要加强我国网络空间话语内容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兼收并蓄、引人向善的优秀品格，在网络话语内容建设中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使网络空间中的复杂信息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同时能放大优秀文化作品的正向功能。这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使全体中华儿女自觉树立正确的三观；发挥理论阐释功能，将外来的、深奥晦涩的理论转换为民族的、人民听得懂的内容；发挥正向激励功能，真正做到以文化人。这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更能将人民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化，使网民在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其二，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形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列宁曾经提出过意识形态“灌输”理论，但是在网络化时代，人民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富，传统的“灌输”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不应该拘泥于课本传播和课堂传播的形式，在网络化时代，谁能先一步进入网络传播渠道，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必须学会“上网”。这要求我们必须借助网络媒介，将传统文化包装成人民喜闻乐见的、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的文化产品，同时打造属于我国的文化品牌。

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首要办法就是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因此我国必须主动提升文化软实力，根植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向功能凝聚人们对我国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自觉抵抗西方错误思潮的入侵，全面构建起抵制文化霸权和信息殖民的文化防火墙，全面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4.3 铸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网络时代中，互联网技术使网络意识形态成为区别传统意识形态的一大特点，但要看到，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其凝聚共识、团结人心的作用没有变，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宗旨没有变，鲜明的人民性、社会性也没有改变。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必须以铸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为核心，加强阵地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效能。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错误思潮和言论的博弈能力，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4.3.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困难重重、千头万绪，虽然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相比，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方法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坚持一元指导思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始终不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做到高屋建瓴、临危不惧，旗帜鲜明地同一切破坏我国网络安全的西方意识形态作斗争。

首先，要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增强各个领域的政治判断力。马克思主义是正确指导我国实践、指明我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的科学真理，因此，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具有夯基筑台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将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看家本领，学懂、弄通、活用。因此，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矢志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补齐“精神之钙”，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我们解决网络空间问题的精神武器，是指导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动指南。对马克思主义和相关理论的学习不仅能提高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而且可以在精神和思想上增强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的抵御能力，主动防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其次，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当前西方国家不仅通过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占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空间，同时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民粹主义等抹黑、污蔑马克思主义，降低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感、信念感。因此，我们在行动上要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在思想上，要坚决同无端指责、故意抹黑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形象的言论进行斗争。主动回应、及时批判、严格打击网络空间中的不实言论和错误思潮，揭露这些“网络杂音”的真实目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有力反击各种错误思潮，彰显中国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实力。

最后，加快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程度。一方面，不仅要推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网络化进程，要加快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阵地，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平台，在网络空间中多层次、多领域、全天候地宣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做到在网络空间的广泛、深远传播；另一方面，各大主流媒体和官方“两微一端”平台要紧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使网民在与马克思主义亲密接触之后消除距离感，自觉认可、相信马克思主义，加固群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稳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思想格局。

4.3.2 创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①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新局面，不仅意味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内容要发生相应的转变，更意味着面对层出不穷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我们要勇于革新、开拓进取。因此，不仅要做到群众掌握理论，更要让“理论掌握群众”，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上，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避免本领恐慌。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展性、人民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因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上我们要做到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避免刻板印象和教条主义，不能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塑造造成高山仰止、阳春白雪的形象，要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方面，传播形式要创新。当前我国还存在照搬传统意识形态工作方法解决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问题的现象，不日新者必日退，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和网络话语内容也必须做到“苟日新，日日新，

^①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又日新”。^①放眼当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从线下社会向网络场域转换不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优势难以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网络化程度不高，创新不足，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开疆扩土”进程缓慢。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嬗变不能简单化为从线下社会嫁接到网络空间当中，而应该将其与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话语传播的特点进行深度融合、改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例如央视主持人朱广权通过网络带货破解“新疆棉”事件，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主流媒体上要有明确的政治站位，但在网络平台上要适当调整传播方式，做到雅俗共赏。创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对当前网民使用频率高、影响力大的信息平台进行价值评估，选择出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最佳传播载体。同时在“两微一端”上要守住阵地，对模糊的理论认识要及时廓清，对老百姓的政策性建议及时吸纳，对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及时解读宣传。

另一方面，话语内容要创新。“一个道理能深入浅出阐释清楚，走到哪里能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讲的话群众喜欢听，写的文章群众喜欢看”。^②一种话语体系的产生，最初总是在一定的学理基础之上的，但其在政治领域和生活领域的传播过程中也必须具备相应的特色才能扩散开来，深奥晦涩的理论往往难以在大范围内传播开来，而理论能不能“掌握”人民，归根结底还是人民“能不能听懂，喜不喜欢听”的问题。因此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要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③必须摒弃冗长乏味、生硬呆板、空洞抽象的说教口吻，让主流意识形态也“上上网”，将其以形象化、日常化、感性化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做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侧改革，加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亲和力。只有真正贴近人民生活 and 通俗易懂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真正的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形式上，既要保证权威性、官方性，又要符合人民性、创新性，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和新技术讲好“中国故

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

② 《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新思想》[J]. 《党的文献》2015(4).

③ 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4-19(01).

事”，墨守成规和盲目革新都不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任何与时代要求和人民真切需要相悖的意识形态都是不能久存的。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若要占据网络空间的领导高地，则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接受基础之上。

4.3.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引导效能

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内容，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思想上层建筑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而且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凝练了国家的发展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人民的行为准则，是新时代指引我们继续奋勇直前、接续奋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引导效能。

充分、正确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效能，首先要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能引起广泛共识的道德标准，凝聚价值共识，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滋生，要增强老百姓的政治领悟力，使老百姓能够自觉认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号召力、影响力、吸引力，通过确立价值目标、凝聚社会力量、实现思想引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②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最有效的检查方式就是观察其在民众中内在认同、自发传播的效果如何。“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③因此，在众多利益诉求碰撞的网络空间中，要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民群众对“急难愁盼”问题的关切为抓手，确立行动指南。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思想引领和凝聚共识的网络效能。

其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引导作用。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人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党在总结了百年奋斗历程之后，对国家、社会、公民作出的新时代的实践准则，深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0.

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高人民的辨别力、自觉自发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网民的社会事件和网络交往中，应当自觉将自己的言行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摒弃各种不良的言行，在进行网络信息接收、言论表达、政治参与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动标尺。这不仅可以使我国网民在面对各种不良信息的侵蚀时能加强主动防御能力，而且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凝聚力、实践引导力不言自明，使人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空间中的各种不良思潮进行反击。

4.4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及应急机制

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其中的言论并非虚拟的，仍然是以现实社会为存在基础的，因此网络舆论可以看作网民们的利益诉求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与集合。对网络舆论要坚持疏而不堵，在舆论爆发之前及时引导，舆论发酵过程中严格依法治网，舆论过后对网民进行综合素质教育。坚持科学预测、人力干预、政策保障全方位进行网络舆情风险预测，做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综合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4.4.1 预测“爆点事件”进行舆情引导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虽然表现在网络空间当中，但其产生的核心仍然是线下社会中的矛盾，而如何针对线下社会中的热点话题、突发事件建立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则是正向引导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基于网络技术的风险防控措施重点在“预”，即预言、预示。通过在舆情失控之前发现网络空间中的风险和漏洞，即可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网络意识形态的一大风险在于其隐匿性强，而利用大数据监控的技术可以及时对网络空间中各类潜在的风险进行预判、分析，即可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整为零。

首先，建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语料库。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主要有网络空间舆情失控造成，因此，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已经造成过重大网络舆论的社会事件中出现的高频词、同音词、同义词进行语料库汇总，对政治事件、社会治安事件等进行分门别类，总结出容易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敏感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用户画像结合语料库，当网络空间出现语料库中的高频词时，即可视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预兆。通过舆情监控部门发出风险预警，提前制定舆情引导策略，降低网络舆论导致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可能。

其次，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尽快解决。网络空间的民意要随时倾听、及时关切，以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同时对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意愿，使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可主流意识形态，争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宣讲员，自己抵抗、反击西方错误社会思潮，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最后，对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深入剖析。人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本质上是为了寻求真相，网络舆论的沸腾恰恰说明人们对真相的渴求，这符合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求真、求知的本性。因此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可以从信息供给侧增效、提速、加量，对已经发生的网络舆情危机及时主动与网民沟通，满足人们对了解事件真相的需求。要及时回应信息溯源结果、事件调查进度，同时保证处理结果公开、透明，并在主流媒体进行全方位信息公示，主动对网络舆论进行回应，平息网络舆情危机，与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非法言论形成对冲。

4.4.2 深入推进网络法制化进程

在网络技术产生和电脑普及的初期，我国政府并未在最初就自觉的意识到网络意识形态需要新的法律法规来用以规训，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这个新鲜的政治议题也未有统一的、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客观来讲，网络空间虽然和线下社会息息相关，却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集中表现为失控的网络舆情会迅速转化为线下社会的群体政治性事件。因此，必须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上，根据网络空间的特殊性颁布、制定有关的法律条例。

一方面，补齐我国网络空间法律力有不逮之处。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领域健康发展的前提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破坏我国网络安全的黑客行为和窃取国家重大机密信息的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涉及个人和企业隐私、国家机密的数据要层层加码，坚决保护；对国外信息和非官方信息要严格审核，进行网络安全数据分级。同时对各种在网络上触底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的擦边球言行完善制度约束。除此之外，对与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加快立法进度，如电商、电子媒体等行业，参照已有法律条例的同时，借鉴别国已经出台的法律，补齐我国网络空间立法的缺漏。另一方面，明确网络

空间各方行为主体的权责。党政部门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领导主体，要加快立法、公正用法、严格司法，对网络违法乱纪行为严厉打击；媒体行业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社会主体，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不能唯“资本逐利”导向，要自觉传播正能量，加强行业自律；网民作为网络空间中的“最大变量”，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最广泛群体，要具有明辨是非的没能力，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理性参与网络行为。通过规范网络空间各方行为主体的规范，建立起依法治网、依法用网、依法上网得多方位、立体化的治网结构，使立法、执法、守法三个环节相互贯通，充分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

4.4.3 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综合素养

网络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拓宽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通道，它改变着人们的信息交流、交往方式的同时，也在传播领域掀起了一场科技革命。这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和综合素质，增强对错误思潮和不良信息的免疫性、防御力。从个体层面上看，网民作为网络空间最大变量，是网络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因此必须坚定理想信念，遵守网络空间的言行规范准则，理性参与网络行为。

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我国公民的价值共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的理想信念、人生目标、立场信仰具有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和实践驱动作用，而价值观作为人们对外界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亲近、相信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因此必须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我国公民的价值共识，找准当前人们的利益切点，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要厚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树立坚定的价值立场，做到在网络环境中即便是雾里看花也能一叶知秋。

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公民的自我防卫、自我规范、自我教育意识。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言论表达往往受主观情感的驱动，同时以利益需求为导向。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这就导致了认知偏差，这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认知相互交织、叠加，导致了事实真相被忽略、雪藏，而各类“伪真相”在有关社会热点事件、政治议题上甚嚣尘上，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掣肘。人们在网络时代的认知模式也从“理性到感性”转变为了“感性到理性”，在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的社交平台，人们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去预设一种“主观

的真相”，在这种情感驱动的行为背后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考证。因此，网民必须转换角色，不能始终给自己预设“被保护者”的角色，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共治当中，成为网络空间共同体中的一员，要认识到，我国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而一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网民们的切身利益也将难以保障。在参与网络行为时，必须建立自我防卫意识，要有完整全面的建构性思维，对网络信息有自己的判断而绝非人云亦云；建立自我规范意识，用反思性思维进行批判深思，减少网络失范言行的产生，汲取经验；最后要时时及逆行自我教育，以辩证性思维对网络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复盘，避免在片面、零碎、不明真伪的信息当中迷失自我。

网民不仅是网络空间的行为主体，更是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有自发性和能动性的要素。因此，网民在参与网络共治、传递网络信息、维护网络环境的进程中要自觉承担维护网络安全责任，在信息筛选和价值取向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同频共振，自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从网络安全的“最大变量”转为“最大增量”。

5 结语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网络空间格局仍然错综复杂，各种势力仍然暗流涌动。因此，我们必须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布局、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底层逻辑、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宗旨为出发点，坚持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

新时代，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坚持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关注重点人群，聚焦热点话题；必须将时代发展要求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说服力、领导力；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必须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增强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网络法制体系，提高依法治网的效能；必须贯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创新科技、培养人才，等等。

新时代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工作道阻且长、任重道远，因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底线思维。让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效助力。

参考文献

(1) 专著类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 [12] 季广茂. 意识形态[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张维为.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4] 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5]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陈锡喜.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7] 张梅主编. 网络文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M].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16.
- [18] 王永进.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 [19] 吴琦等. 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杨立英, 曾盛聪. 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21]张骥. 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 [22]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23]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24]王承哲. 意识形态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25]李艳艳. 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 [26]汤荣光. 走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处[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 [27]刘世衡.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 [28]克拉姆尼克, 华特金士. 意识形态的时代[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3.
- [29]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M]. 孔兆政、蒋龙翔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30]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2.
- [31]马丁·杰.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M]. 单世联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32]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铨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 [33]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4]埃瑟·戴森著. 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胡泳等译, 海南:海南出版社, 1998.
- [35]劳伦斯·莱斯格. 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 [36]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任孟山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 [37]阿尔温·托夫勒. 权力的转移[M]. 吴迎春, 傅凌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 期刊类

- [1]李艳艳.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05):46-55.
- [2]许川川, 孙洲.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J]. 理论探

- 讨, 2022, (03):118-124.
- [3]姚元军, 朱赞瑶.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与治理[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 (03):92-99.
- [4]米华全.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特征及机制构建[J]. 理论导刊, 2022, (02):64-69.
- [5]陈双泉, 韩璞庚.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治理逻辑[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 (01):193-201.
- [6]李豪男.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实践路径[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4(01):72-76.
- [7]徐艳玲, 孙其战. “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与破解策略[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6(06):95-104.
- [8]丁强, 牟德刚, 孔德民.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表象、生成与治理[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08):149-153.
- [9]聂智, 肖皓文. “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08):27-32.
- [10]华锋, 王永贵. 新时代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创新逻辑[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8(02):41-46.
- [11]张瑜. 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与正确导向[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04):121-129.
- [12]赵雪.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引导机制论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2):97-102.
- [13]郝保权.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趋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01):127-135.
- [14]卢岚.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J]. 湖湘论坛, 2021, 34(01):54-64.
- [15]王斌, 肖光荣.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 (03):6-11.
- [16]肖唤元, 郑晶晶.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四重“论”域透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 (01):9-16.

- [17] 蒋成贵. 算法推荐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及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 (07): 78-82.
- [18] 孙炳炎.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基本策略——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 (02): 1-7.
- [19] 蒋桂芳.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 (01): 79-84.
- [20] 刘建华. 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变化及我们的应对[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01): 140-149.
- [21] 韩影, 张爱军.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J]. 理论与改革, 2019, (01): 76-85.
- [22] 付安玲, 张耀灿. 大数据助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05): 105-112.
- [23] 杨嵘均. 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01): 98-107.
- [2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 北京: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3: 32 (02): 39.

(3) 学位论文

- [1] 李凯.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D].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
- [2] 周欢.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研究[D].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
- [3] 霍广涛.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D]. 西南大学, 2021.
- [4] 徐晶晶.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多元协同治理路径研究[D]. 扬州大学, 2021.
- [5] 黄云妍.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研究[D]. 西南大学, 2020.
- [6] 林黛颖. 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D]. 北京邮电大学, 2020.
- [7] 吴赞儿.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论述的研究[D]. 浙江大学, 2020.
- [8] 林樱枝.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D]. 南华大学, 2020.
- [9] 张鲜鲜.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境遇与实践理路[D]. 兰州大学, 2020.
- [10] 米华全.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 [11] 左淑雅.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9.
- [12] 马孟阳.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D]. 云南师范大

学, 2019.

- [13] 梁佳苗. 自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浙江大学, 2019.
- [14] 杨洋.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9.
- [15] 孙志程. 新时代加强党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兰州大学, 2019.
- [16] 郑秋伟. 网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研究[D].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9.
- [17] 卢建有. 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 [18] 李春欣.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18.
- [19] 苗国厚.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D].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 [20] 黄冬霞.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D].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 [21] 程金凤. 习近平互联网思维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D].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7.
- [22] 张莉. 自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云南财经大学, 2017.
- [23] 高舰.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 [24] 张浩.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D]. 北京工业大学, 2016.

(4) 报纸类

- [1]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03-12-08(01).
- [2]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26(01).
- [3] 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19(01).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 2023-03-01(009).

致谢

屡变星霜，月落河倾，行文至此，思绪万千。硕士三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驱诸不息。想象中论文完成后的颯然而笑并未出现，反而仿若胸中巨石砰然落地，却寂静无声，然纵有万语千言，也只能借此言抒一二。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李兴平教授。三年学业生涯中，李老师卑以自牧、不吐不茹、事必躬亲、诲人不倦。老师严谨的学风、细致的态度、正直的作风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引导着我走好为人、科研的每一步路，自己虽不能行至老师的高度，然心向往之。在论文的选题、开题、写作、修改的每一个环节，老师都耐心指点，提出了许多宝贵且中肯的建议和指导，最终使我能顺利地以这份论文作为三年学业的答卷呈现在诸位眼前。此外，还要感谢张梦涛、魏贤玲、刘文玉、庞庆明、李晓蓓、赵玉华、赵俊、陈张林、解慧娟、李娟及姜丽娟老师在学业期间对学生的不倦教导与鼎力帮助，使学生在三年之中明研究之理、学处世之道、为正直之人。

其次，感谢我的父母、兄姐、家中所有长辈、亲人。在我的学习期间，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使我能心无旁骛地完成学业。我的爸爸妈妈虽然并不擅于学术科研，但时时提醒我万事须尽力为之、全力以赴，在生活中，从不过分干涉我的选择，给予我选择人生方向的最大自由，使我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生长。我的爷爷奶奶虽然年过古稀，但经常教育我要修身律己，不要辜负韶华。家中的长辈和哥哥姐姐们在我于金城攻读硕士期间，无不煮粥焚须，给予我深厚的关爱。我的妹妹对我也事事关心，如醒骨真人，使我的精神状态能破而后立，不至于歧路亡羊。

最后，感谢身边诸位。其一感谢同门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幸得师门情谊，结为金兰之契，感念不易。其二，感谢同窗好友邓博文、何意浩、蒋若宸、苏文静、秦雯等，幸有诸位一接如旧、谊切苔岑，使我每次回想起硕士期间的点点滴滴，也并不总是雨井烟垣。其三，感谢舍友李江、景仕通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中千万买邻、公诸同好。今与诸位伯劳飞燕，唯愿花晨月夕。难用纸笔道尽心中所思，只能再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海波

2022年11月17日